

# 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综述

张同乐

---

---

华北伪政权的研究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1951年北京联合书店和上海大东书局分别出版了郭士杰的《日本侵华暴行录》和储华的《日寇的滔天罪行》。这两本书虽然只是一般的通俗历史读物,但书中触及到华北沦陷区研究这一课题。随后又发表有关研究沦陷区的论文30余篇。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者开始注意对日本侵华历史进行专题性的探讨。《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发表了吕明灼的论文《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所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这篇论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研究华北沦陷区和华北伪政权的早期成果,带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在史料整理与出版方面,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翻印了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1946年编写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该书汇集了有关华北日伪政权的部分报刊文稿,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些初步的资料。

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的历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出版逐年增多,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的史料有:北京市档案馆选编的《日伪在北京地区的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日伪北京新民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以

后,对华北沦陷区和伪政权的研究进入了深入的学术探讨阶段。其突出特点是:史学工作者深入挖掘了大量原始档案资料,以实证的方法多层次地研究华北沦陷区和伪政权。其中资料性成果有:南开大学历史系、唐山市档案馆的《冀东日伪政权》(档案出版社1992年5月版)。北京市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选编的《日本侵华罪行实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居之芬等编的《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章伯锋、庄建平的《抗日战争·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6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的《华北治安强化运动》(中华书局1997年12月出版),《华北大“扫荡”》(中华书局1997年12月出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选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9月版)。

随着史料的发掘,出现了一批学术价值较高的论文和著作。如:曾业英的《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控制与掠夺》(《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和《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居之芬的《日本对华北经济统治和掠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费正、李作民、张家骥的《抗战时期的伪政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居之芬、张利民的《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朱德新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蔡德金的《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2月出版,内容涉及华北沦陷区),冯崇义的《国魂,在国难中挣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从内容上看,华北沦陷区和日伪政权的已有研究成果分别如

下:

(一) 关于日军和伪政权在华北沦陷区暴行的研究。论者主要集中在日伪在华北进行的“大扫荡”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吕明灼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所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使用《解放日报》《实报》等资料,对华北“治安强化运动”的过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析。王国华的《从档案资料看日伪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3期),着重说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的基本方针是发挥华北伪政权的作用,以达到掌握“民心”,开发和掠夺经济资源的目的。由于中国抗日军民坚持抗日斗争,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谢忠厚的《华北甲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之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和徐勇的《侵华日军驻北平及华北各地细菌部队研究概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分别利用中央档案馆和日文资料,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日军驻北平甲一八五五部队在北平和华北的细菌战罪行。

另外,研究日伪华北暴行的成果还有: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主编的《华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95年5月版)、李秉新主编的《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何天义主编的《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和《石家庄集中营》(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陈平的《千里“无人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李恩涵的《日军在山东的“扫荡战”与“三光作战”(1937—1945)》(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下册,1995年6月)和《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政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二) 关于华北伪政权建立到解体的研究。涉及“中央”伪政权研究的有张炳如的《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版),该文简要叙述了华北敌伪

政权的历史。尹冰彦的《对〈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的补正》(《文史资料选辑》第 48 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1964 年 9 月版)。南开大学历史系、唐山市档案馆编著的《冀东日伪政权》一书,则对日本导演的华北自治运动和殷汝耕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进行了研究。费正、李作民、张家骥的《抗战时期的伪政权》(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7 月版),书中辟专章对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进行了论述。蔡德金的《历史的怪胎——汪伪国民政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2 月第 1 版),也在部分章节中对平津地方维持会、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历史作了介绍。王琳的《对抗战时期华北伪政权的考察》(《延安大学学报》1997 年第 1 期)叙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华北伪政权的出笼、延续到最终崩溃的发展过程。这方面的成果还有:台湾学者司徒重石的《抗战时期华北伪组织内幕》(《春秋》1968 年第 6 期)和《抗战时期华北伪组织内幕》(续)(《春秋》1968 年第 7 期),王仰清、许映湖的《日本在华傀儡政权述要》(《历史教学问题》1983 年第 2 期),田苏苏的《伪华北临时政府始末》(《河北文史资料》第 28 辑,1989 年),孙武存、田树茂的《日本侵占中国时期的傀儡政权》(《党史文汇》1995 年第 9 期)。

关于日伪华北四省、三特别市等地方伪政权的研究也有一些成果。如:邵云瑞等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的前前后后》(《南开大学学报》1986 年第 6 期),傅清沛的《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对青岛的殖民统治与掠夺》(《山东社会科学》1995 年第 5 期),王第荣的《日伪时期青岛见闻之点滴》(《文史资料》山东青岛,第 4 辑,1983 年),王士花的《日伪时期华北农村的县级政权》(《青年学术论坛·2001 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 11 月版),吴根的《日本土肥原机关的“吴佩孚工作”及其破产》(《近代史研究》1982 年第 3 期),朱德新的《略论日伪对冀东农村基层行政人员的

控制》(《中山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张宗平的《日伪在北平沦陷区的残暴统治》(《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赵红的《北平沦陷时期的地方维持会》(《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2期),李铁虎的《北京临时政府辖区沿革述略》(《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3期),北京市政协编写的《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87年7月版),北京市政协编写的《日伪统治下的北京郊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版),朱德新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刘大可等的《日本侵略山东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荣国章、孔宪东、赵晋的《北平人民八年抗战》(中国书店1999年3月版),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侵华日军在山西的暴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牛新田的《山西日伪政权的建立和覆灭》(《山西文史资料》第41辑(1985年9月)),邢汉三的《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3月版),天津市政协编写的《沦陷时期的天津》(津新图准印号:001542,1992年)等。

对华北伪政权与侵华日军以及与其他日伪政权关系的研究。有房建昌整理的《日文档案中的1939年3月10日—1942年11月1日驻北京的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北京档案史料》2001年第1期,新华出版社2001年4月版)。徐立刚的《伪临时政府与伪维新政府政治关系演变浅析》(《民国档案》1996年第11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选编的《抗战时期南北两伪政权合流档案选》(《历史档案》1983年第2期)等。

(三)关于华北伪政权主要人物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研究所涉及的华北巨奸主要有王克敏、王荫泰、缪斌、周作人、汤尔和等。黄美真的《抗日战争时期三个伪政权及其主要头目》(《人物》1984年第3期)对华北日伪政权的主要头目王克敏、王揖唐作了简介。王春南的《汉奸王克敏生平纪析》(《学海》1995

年第2期)对王克敏充当汉奸的历史作了介绍,探讨了其投敌的经过与心态。王春南的《巨奸王荫泰与华北伪政权》(《学海》1996年第6期)对王荫泰从附逆到病死狱中的经过进行了论述。冯崇义的《国魂,在国难中挣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对汉奸心理进行了分析。

另外,研究华北日伪政权人物的论著还有:樊瑛华的《缪斌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唐都学刊》1995年第4期),吴江的《从胡适说到周作人》(《炎黄春秋》2000年第6期),姜德明的《周作人谈汤尔和》(《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6期),黄美真的《汪伪十汉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张菊香、张铁荣的《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孙玲玲的《抗战时期汉奸伪军集团形成的社会因素探析》(《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窦不敏的《华北沦陷前后的王克敏梁鸿志与汪精卫》(《春秋》1973年第10期),罗久蓉的《历史情境与抗战时期“汉奸”的形成——以1941年郑州维持会为主要案例的探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下册,1995年6月)。台湾学者洪桂己的《近代中国外谍与内奸史料汇编》(台北1986年6月编印)等。

(四)关于华北日伪统治区经济的研究。主要有曾业英的《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控制与掠夺》(《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和《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居之芬的《日本对华北经济统治和掠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居之芬等编的《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章伯锋、庄建平的《抗日战争·日伪政权与沦陷区》第6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高德福的《抗战时期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南开史学》1982年第2期),陈静的《沦陷时期北平日伪的金融体系及掠夺手段》(《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居之芬的《关于日本在华北

劳务掠夺体系与强制劳工人数量若干问题考》(《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居之芬、庄建平主编的《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9月版),任兰云的《东亚经济恳谈会与日本对我国华北的经济统治》(《历史档案》1998年第1期),王乃德的《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华北资源述评》(《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王士花的《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合作社》(《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林明德的《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1933—1945)》(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1980年6月),陈慈玉的《战时日本对华北煤矿的统治(1937—1945)》(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下册,1995年6月)等。

(五)关于华北伪军、警察、监狱的研究。主要有马重韬的《齐燮元与华北伪军》(《中华文史资料库》第5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4月版),以及陶广仁的《伪华北治安军概述》(《河北文史资料》第16辑,1985年),向风的《日伪时期的北京警察局》(《中华文史资料库》第5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4月版),邵青的《伪华北治安军的组建活动情况》(《唐山文史资料》第3辑,1986年)。有关华北伪政权的综合性著作和历史档案资料集等,也有一些关于华北伪军、警察、监狱方面的研究。

(六)关于日伪统治下的华北文化教育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侧重于华北沦陷区的奴化教育、新闻统治、出版,以及日伪在华北推行的“东亚联盟运动”、“新国民运动”等。主要成果有:孙新兴的《日本在青岛的殖民奴化教育》(《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以大量的历史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者1938年至1945年间在青岛实施的殖民教育和奴化归附教育。钟春翔的《抗战时期的山东日伪教育》(《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论述了日军侵占山东期间实行的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教育方针及实践。陈言的

《抗战时期沦陷区“色情文学”新探》(《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1 期), 以华北沦陷区名噪一时的“色情文学”为例, 论述和分析了在抗战大背景下的沦陷区“色情文学”的形态、性质和成因。汪朝光的《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电影检查》(《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1 期) 内容涉及华北, 沦陷区伪政权实行的不同形式的电影检查。

其他论著还有: 夏潮、史会来的《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封建礼教泛滥现象分析》(《学习与探索》1995 年第 5 期), 朱德新的《日伪对冀东农民的精神侵略》(《民国档案》1995 年第 3 期) 等。

(七) 关于日伪华北“民众”团体(包括“红”、“白”团体) 研究。这方面研究主要涉及到“天门会”、“中华民国新民会”等。如: 乔培华的《日军对天门会的怀柔政策及其破产》(《史学月刊》1992 年第 1 期) 论述了河南省北部农民团体天门会先受日本伪化, 后被共产党利用暗中支持抗日的转变过程。曾业英的论文《略论日伪新民会》(《近代史研究》1992 年第 1 期) 论述了日伪在沦陷区组织“新民会”, 开展“剿共灭党(国民党)”、“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等情况。云章的《日寇卵翼下的“新民会”及其活动》(《党史研究资料》1981 年第 8 期) 则认为, 新民会是以日本大政翼赞会为模式建立的, 它是一个既不像纯牌政党, 又不像民众团体的法西斯傀儡组织。

纵观华北伪政权的研究, 虽然取得上述成果, 但由于大量的一手的日伪档案、报刊史料尚未被史学研究者整理和利用, 口述史料的整理和留存亦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使得一些专题研究尚不深入, 尤其对日伪统治下华北社会方面的研究更显得欠缺。如对华北地区天门会、“新民会”以外的其他“民众”团体(包括民族的、宗教的) 研究则不多见。如日伪在华北组织的“回教联合会”、“红卍字会”等都缺少深层次的研究。

(作者张同乐, 1957 年生, 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刘兵)